

---

#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 轰炸重庆报道探析

闫立光 郭永虎<sup>1</sup>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抗战期间, 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和中国的战时首都, 遭到了日军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这一期间, 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派往重庆特约记者以及援引其他西方驻重庆媒体的报道等多种形式, 真实记录了日军集中轰炸中国平民和民用设施、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 以及重庆民众英勇反轰炸斗争的主要历史过程。这些报道不仅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之暴行, 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而且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军民抗战形象, 建构出一种谴责日军残暴、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导向。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泰晤士报》 日军 重庆 无差别轰炸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18)06-0005-08

抗战期间, 日军为彻底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实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之目的”, 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无差别轰炸, 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和平民伤亡, 是从空中进行的恐怖大屠杀。这一期间, 西方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以“第三方”的视角真实记录和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主要历史过程。基于此, 笔者以《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原始历史文本为依据, 对其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相关方面的报道及其价值作一番探析。

## 一、《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概况分析

### (一) 基本数据分析

全面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 日军逐渐开始对其进行轰炸。自此, 重庆一度成为《泰晤士报》等新闻媒体的重要关注点。据统计, 从 1938 年到 1944 年日军轰炸重庆六年多的时间内, 《泰晤士报》关于重庆的报道总量达 537 篇。在日军无差别轰炸最为集中的 1939 年至 1941 年期间, 其对日军轰炸重庆密切相关的报道达 69 篇。其中, 直接以“轰炸重庆”或“空袭重庆”为标题的相关报道就有近 30 篇, 日军的轰炸暴行由此可见一斑。

### (二) 消息来源分析

新闻消息源是考察新闻是否具有可信性的重要依据, 在新闻信息传播中, 媒介信息源决定了新闻的真实性。从《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消息来源来看, 首先是来自于《泰晤士报》驻重庆记者的相关报道。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后, 《泰

---

<sup>1</sup>**作者简介:** 闫立光(1986—), 男, 河北邢台人,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抗日战争史、革命史研究。郭永虎(1972—), 男, 吉林白山人,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

晤士报》专门派通讯员前往重庆。1938年10月5日,该报刊登了其特约通讯员关于日军轰炸重庆的第一篇报道<sup>[1]</sup>。自此,驻重庆记者的新闻稿件则成为《泰晤士报》获知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事实的主要来源。其次就是援引于其他驻重庆西方媒体的报道。比如,路透社等。路透社当时在重庆有分社,其记者记录下许多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珍贵画面,为《泰晤士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消息来源。再次是《泰晤士报》驻上海、东京、伦敦等国外各大城市通讯员通过外交渠道和报纸了解到的关于日军轰炸重庆的情况。

### (三)新闻体裁分析

新闻体裁是把握媒体对相关事件报道认知状况的重要参考。据整理和分析,《泰晤士报》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类新闻体裁:其一是消息类,这是该报较多采用的新闻报道类型。这一类体裁直接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包括“五四”大轰炸、“六五隧道大惨案”等等。其二是社论类,主要包括编辑部和读者来信对重庆大轰炸及其影响进行的选择性描述与评论,表达和传递《泰晤士报》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其三是图片类,图片报道是洞察事件最为直观的方式,《泰晤士报》通过不定期地刊登重庆大轰炸的图片集,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感,以引起其对事件的关注。比如,该报在1939年6月26日和1940年10月2日分别刊登了重庆遭受轰炸后的惨状及宋美龄亲临轰炸场面的图片集<sup>[2]</sup>。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泰晤士报》相关报道概况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该报不仅以多元化的新闻体裁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炸,而且其消息基本上来源于《泰晤士报》派往重庆通讯员和援引于其他媒体驻重庆的新闻报道,可信性强。这样的新闻框架为进一步探析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前提。

## 二、《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历史文本分析

### (一)关于大规模轰炸中方民用设施和平民的报道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逐渐改变其先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重新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强调一方面将军事打击中心转向对付后方抗日游击战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对日妥协。因此,对当时中国战时首都和国民党军事指挥部——重庆进行的长时期不分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无差别轰炸,就是适应这一战略、扩大侵略、实现战争目的而采取的重要行动。

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始于1938年,结束于1944年,主要集中于1939年至1941年。这期间,《泰晤士报》通过跟踪式报道记录了重庆市遭受日军轰炸的状况。限于篇幅,下面就该报1939—1941年间对日军集中空袭重庆民用设施和平民的主要相关报道进行梳理和分析。

从1939年5月起,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市区人口密集区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和人员伤亡。为了充分揭露日军这一惨绝人寰的轰炸暴行,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给《泰晤士报》编辑部写信,摘选了宋美龄在亲历与目击“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通过信函向其夫人描述的惨状:“日军战机在5月3号、4号和12号飞过城市上空,扔下许多爆炸弹和燃烧弹。

它们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化为灰烬和残骸,并且蓄意而残忍地杀死我们数以千计的百姓。在4号那一天,死了近5000人,伤者约3000人,20000人无家可归。日军空袭过后,光挖清已烧毁房子的废墟就花了十天的时间。”<sup>[3]</sup>这些惨不忍睹的画面从侧面反映了日军无差别轰炸之残暴。而且,针对当时重庆多木制建筑的特点,日军在进行空袭的过程中还扔下了大量的燃烧弹,其落到地上通常会造造成连片大火,即使远离爆炸地点的房屋及人也会被摧毁和烧死。据相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就向市区的人口密集区投下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4572人、炸伤3637人,市区10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大火近3天才被扑灭。其中,无辜市民伤亡达8000多人<sup>[4]</sup>。

1940年春天,日军再次集中大规模的轰炸兵力,并配备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实施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轰炸计划,使得日机对重庆的轰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1940年5月30日,《泰晤士报》报道指出:“5月份,由日军空袭产生的伤亡总数已经超过2000。”<sup>[5]</sup>日本官方声称,他们不会停止对重庆的轰炸直到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被击垮。

6月12日,日军出动154架战机空袭重庆。袭击者基本上向城市的每一地区都投下炸弹,摧毁了成百上千的房屋,引燃起大火,一直烧到晚上。伤亡的人数估计在600左右。日军对重庆长达6周的轰炸,已经摧毁和破坏了城市一半多的建筑。尽管日军不间断的轰炸给人民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们的意志毫无削弱的迹象<sup>[6]</sup>。为此,日军继续加大对重庆的轰炸力度。6月28日,82架日军战机空袭重庆,嘉陵江两岸许多重要地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立中央大学的多处建筑也被炸毁<sup>[7]</sup>。8月20日,约200架轰炸机空袭了重庆。日机扔下的爆炸弹造成大面积的破坏,燃烧弹在市区一个差不多1英里长,3个街区宽的地方引燃起大火。

据估计,有20000人无家可归,200人伤亡。轰炸之后,大风刮了12个小时,尽管尽最大努力控制火势,但大火还是迅速蔓延<sup>[8]</sup>。8月21日,日机再次向重庆商业密集区扔下燃烧弹,引燃起大火,横扫了方圆半英里的地方。这是重庆遭空袭史上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场火灾。尽管伤亡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使得数以万计的百姓无家可归,成百上千的建筑被烧毁。昨天的火还没有扑灭,今天的空袭又将市区附近的地方引燃。89架日机参与了今天的空袭。据称,日军正在趁这一年当中天气比较热和干的时节企图有计划地烧毁中国的首都<sup>[9]</sup>。

1941年夏天,日军调动大批飞机,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展开了新一轮的轰炸。他们采取多批次、长时间的疲劳轰炸战术连续空袭重庆,致使大量市民经常不得几个小时处于空袭警报和拥挤于防空隧道之中,由此而死的人数也很多。1941年6月7日,《泰晤士报》刊登了“700人在避难中死亡”的报道,称“昨天早上,日军空袭重庆期间,700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一个大的地下隧道里避难,因窒息而死。

由于通风比较差,所以造成了空袭中的这一重大灾难。……扔到城市西门附近的燃烧弹引燃了周围一平方英里内的房屋和小商店,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无家可归。”<sup>[10]</sup>紧接着1941年6月9日,《泰晤士报》以“大规模空袭重庆”为标题概述了“六五隧道大惨案”的基本经过,报道称:“6月8日,重庆讯:周四晚上日军空袭重庆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恐怖的惨案,2000人在建设极好的隧道中窒息而死。空袭者在晚上7:30、9:15和10:30分3波进行轰炸,每波出动飞机9架。

在首次空袭后,人们离开了隧道。但当第二波来的时候,他们又匆忙跑回去,致使多人死亡。”<sup>[11]</sup>这是二战期间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开始将大部分兵力转向同英美交战,其对重庆的轰炸频率逐渐降低,作为英国主流媒体的《泰晤士报》也开始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英日、美日的战事上,对日军后期轰炸重庆的报道也相对减少。

通过梳理《泰晤士报》关于日军集中轰炸民用设施和平民的报道,可以窥见日军的轰炸目的和手段。从目的上来说,显然日军企图通过炸毁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以彻底击垮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从手段上来说,从1939年到1941年间,其不断制定和调整轰炸战略,综合采用了地毯式轰炸、疲劳式轰炸、月光轰炸等多种形式,可见日军实施的轰炸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 (二)关于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的报道

日军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轰炸,不仅造成中方财产的惨重破坏和平民的大量伤亡,甚至蓄意空袭西方驻重庆的外事机构和人员等,招致了一次次引人注目的外交抗议事件。这是日军为独霸中国与西方列强矛盾激化的结果与表现,也是日军重庆大轰炸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泰晤士报》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日军飞行员在执行轰炸重庆的任务时,尽管手中的地图已经用红笔标注出外国财产的位置,但还是对其进行了多次空袭。1937年5月6日,《泰晤士报》报道“五四”大轰炸时,描述了英国等国家权益遭受日机侵害的事实,文章称“5月5日,上海讯:昨天的空袭发生在黎明之时,袭击者飞过市中心,在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事馆在内的地方,扔下了两排炸弹。一些炸弹落在

---

了英国领事馆,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所住的地方。

据官方报告,斯达克托总领事的房子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当时他和妻子以及员工正在地下室避难。大使的秘书玻利维亚先生被落下的瓦砾砸到头部,轻微受伤。”<sup>[12]</sup>对于这些国家领事馆被轰炸的原因,日本海军部发言人辩称:“虽然非常后悔,然又无法避免。因为空袭者遭到了中方50个高射炮和重型机枪的凶猛火力,而且它们离外国的大使馆很近,为了自卫不得不进行压制。飞行员被命令要尊重外国财产。

但当他们需在自身安全和轰炸到外国财产的危险性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其拥有一定灵活性。”<sup>[12]</sup>日军蓄意轰炸外国领事馆和其给出的借口,引起了西方国家强烈的反应。1939年5月13日,《泰晤士报》刊登报道称,“5月12日,东京讯:英国、法国和美国大使已经就日军轰炸重庆提出了抗议。谈到日军海军当局关于炸弹落到英国领事馆的解释,卡尔大使称地面上高射炮的存在不能成为日军可以实施无差别轰炸的理由。”<sup>[13]</sup>

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抗议,日本虽承诺会采取相关制止措施,但外国财产遭炸毁的情形仍不时发生。1940年6月26日,《泰晤士报》刊登“炸弹摧毁英国的领事馆”的报道,“6月25日,重庆讯:昨天,英国和法国领事馆再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英国领事馆直接被击中,几乎完全摧毁。另一个炸弹严重破坏了毗邻领事馆而属于英国外交部的房屋。第3个炸弹,沿着领事馆的主楼掉下来,但没有爆炸,只造成了较小的损失。全部员工都躲在防空洞里,很安全,没有人受伤。其中一个炸弹掉到了法国领事馆的院子里,炸死了5个不是领事馆员工的中国人,建筑造成的破坏不大。”<sup>[14]</sup>类似《泰晤士报》关于日军轰炸英国等西方领事馆和其他财产的报道还有很多。

比如,1939年8月5日,《泰晤士报》报道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领事馆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和他妻子居住的房屋被轰炸的消息<sup>[15]</sup>。1941年6月9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日军重型轰炸机空袭英国领事馆办公大楼的报道<sup>[11]</sup>。1941年6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了日军对来自图图伊拉美国军事基地的一艘美军战舰、美国军事专员上校威廉·迈耶的办公室、美国海军餐厅和标准石油公司办公室以及英国领事馆出版专员府邸等轰炸状况<sup>[16]</sup>。

1941年7月2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日军炸毁英国领事馆中国顾问包克本府邸,并致使包克本先生和艾伦夫妇受伤的报道<sup>[17]</sup>。1941年7月9日,《泰晤士报》报道了日军再次轰炸英国领事馆,其中一个炸弹直接击中主楼中部大使书房的消息<sup>[18]</sup>。1941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登报道指出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在6月2日、6月7日和6月29日遭到日军轰炸<sup>[19]</sup>,等等。

从《泰晤士报》关于日军轰炸重庆波及西方权益的报道来看,一方面日军对其开展的空袭行为具有蓄意性,当西方国家数次向日本表达抗议并按照日本要求将其本国人员和机构搬迁至扬子江南岸,在日军明知它们具体位置后,却依然反复对其进行轰炸;另一方面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行为具有国际性,即无差别不仅体现在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上的无区别性,而且也体现在中方和西方在重庆的机构、设施和人民上的无区别性。

### (三)关于重庆各界民众进行英勇反轰炸斗争的报道

日军对重庆长时间、大规模、野蛮残酷、无差别的大轰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但是,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英勇的重庆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持不懈地疏散人口、开凿防空避难设施、开展消防救援工作,进行了一场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反轰炸的顽强斗争,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将重庆夷为平地的阴谋。重庆军民英勇斗争的精神,《泰晤士报》在报道日军轰炸重庆的过程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1939年5月,日军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后,重庆当局一方面组织各方开展清理、救援和志愿工作,另一方面疏散百姓离开,以尽可能避免伤亡。对此,1939年5月8日,《泰晤士报》报道了蒋介石及其政府正在指挥大规模百姓撤离重庆市区的消息<sup>[20]</sup>。“五三”“五四”及随后几天的大轰炸,使得重庆大量房屋被毁,平民伤亡惨重,到处是焦土烟火、死尸枕藉,急需清理废墟、救助难

---

民。为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任劳任怨、众志成城，彰显了重庆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不屈意志。1939年6月14日，《泰晤士报》刊登的读者来信，记录了宋美龄视察救援工作的所见，以及对民众不畏艰辛、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精神的赞扬，她说：“轰炸过后的几天，费了很大的劲才清理出部分街道和死人的尸骸。稍后的工作又花费了一段时间。”

此时，这里的恶臭气越来越浓，在其附近生活居住已不大可能。中国人民的精神是伟大的，他们既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这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人民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但精神却经受了火和血的洗礼。如果日本人认为他们通过如此残酷而蓄意的冷血式屠杀就能打垮我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空袭一结束，总司令就命令所有属于政府和个人的轿车和卡车，包括他和我的私人轿车，都用来向城外运输难民。大量的食物供给站迅速涌现，就像是咒语召唤出来似的，由不同的组织和志愿者负责分配。我们的妇女做得也非常好，在近两年的战争后，如果她们屈服于歇斯底里和疲劳是无可非议的，但她们坚持了下来，依然精神饱满地、不屈不挠地去努力挽救那些不幸者。

在其中的一次空袭中，我确信我们的办公地点和员工将毁于一旦，因为火从三个方向朝我们汹涌而来，并且当时还刮起了大风。但是，后来风向改变，我们活了下来。……我发现员工们都很平静和镇定。他们已经打包好了所有的档案和办公室文件，等待着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回想一下，他们能做到这样，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假如风的方向没有改变，所有的通道都会被切断。然而，你肯定会猜到那天晚上我让他们搬到了城外。但是，第二天清早，他们又回到市区服务于各种难民站，帮助寻找由于空袭而成为的孤儿。……不久之后，空袭再次来临。因为日军鼓吹要将我们献祭。我们通过拆毁一些挨着非常近的房屋等一切尽可能采取的方法来进行防御。”<sup>[3]</sup>

1939年，特别是5月份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市民死伤惨重，社会秩序混乱动荡。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开展有效的反空袭斗争，最大限度减少轰炸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则成为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从国民政府到重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充实和完善预警体系，修筑防空洞避难设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伤亡人数。对此，1939年11月18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方面坚强不屈”的文章给予了报道，称：“10月22日，重庆讯：一年多前，自从中国的首都由汉口迁往重庆，这个位于扬子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旧式中国城市，就成为了日军无数次空袭的目标。”

损失最为惨重的空袭是在5月份，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生。但是，目前重庆拥有了一套防空系统，可能在以下两个领域做得比较好。其一是警报系统方面。第一次警报声会在日军轰炸机从汉口起飞不久后响起，而它们飞到重庆需要一个多小时。这给了很多人逃往周边乡村的时间。第二次警报声会在日机飞过万县（笔者注：现重庆市万州区）的时候响起，那时它们必然会来重庆。第三次警报声会在日机离城市不远时响起，也是所有活动停止的信号。

其二是防空洞方面。政府办公处和许多重要的官员都拥有混凝土建造的防空壕。普通百姓能躲到通过钻凿石灰岩而修好的大量隧道中避难。大部分的这些隧道都能容500人，而更大一些的可以容1000多人。尽管在最近的一周内，响起了10次警报，人们不得不夜复一夜地从他们的床上爬起来，在又挤又热的防空洞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物质损失，特别是由于防火隔离线将火与市区切断开来。无论怎样，人们在空袭中的精神状态，还是值得赞扬的。一天当中，每个人能可以听到弹药的爆炸声和工人钻隧道的锤子声。”<sup>[21]</sup>

到1941年，重庆防空斗争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因轰炸而造成的伤亡人数也有所减少。这一点在1941年5月12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可以得到印证，其称“据官方声明，54架飞机参与这次空袭，造成10名平民伤亡，尽管全部都是中国人——但这显然间接证明了城市防空系统的有效性。”<sup>[22]</sup>同时，也侧面突出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

### 三、《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史料价值与作用

（一）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轰炸重庆之暴行，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在 1939 年至 1941 年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最为集中的 3 年间,《泰晤士报》通过其特派记者和援引其他媒体驻重庆通讯员的报道等多种途径跟踪式记录和见证了重庆大轰炸的主要过程,为这段历史保留下一份不同于中日双方文献的重要文本,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首先,《泰晤士报》关于日军大规模轰炸重庆的报道有助于印证历史事实。“大众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实录当代史,而且往往比任何官方文件都全面丰富。”<sup>[23]</sup>由于《泰晤士报》对日军大规模无差别轰炸重庆,特别是重大事件(比如“五三”“五四”大轰炸、“六五隧道大惨案”等)的报道多是来自于目击者,更为真实、具体和直接,在一定层面上能够起到与中日资料形成互补互证,考证某些说法和伤亡数据之作用。

比如,关于“五三”“五四”大轰炸的伤亡人数,以往学者多是采用《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5 月 3、4、12、25 四日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汇报表》中记录的“炸死 4572 人、炸伤 3637 人”数据。但据《泰晤士报》1939 年 12 月 7 日的报道称仅 5 月 4 日就炸死 4572 人、炸伤 3637 人<sup>[24]</sup>。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可能还需要学术界对该数据开展进一步的考证。其次,重庆大轰炸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暴行之一,《泰晤士报》作为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史料,从微观视角驳斥了日军否认和美化其侵华史的谬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不断提出的“侵略”未定议论、“大东亚战争正义论”等种种言论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罪行。事实终究是事实。《泰晤士报》所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证实了日军侵华的计划性、战略性,而且给予了日本右翼无视侵华战争中牺牲的数以万计无辜生命,极力掩盖其野蛮罪行以有力回击。

## (二)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形象,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从《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报道主题和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形象建构来看,其一方面着笔于记录和描写侵华日军对中外财产及重庆平民的大规模无差别狂轰滥炸,强调日本法西斯置国际法规与人类公理于不顾的残暴性和野蛮性;另一方面着重于赞扬和传播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报道和建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顽强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形象。

比如,1939 年 11 月 18 日,《泰晤士报》刊登“中方坚强不屈”的报道,称赞了重庆人民在遭受日军空袭中的英勇精神状态<sup>[21]</sup>;1940 年 9 月 20 日,《泰晤士报》刊登消息称,尽管日军不断地轰炸重庆,但是中国人民不会屈服<sup>[25]</sup>;1941 年 8 月 21 日,《中央日报》援引的《泰晤士报》“中国英勇抗战,以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的社论文章,也是高度评价日军轰炸下重庆人民不畏强暴,并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表率的重要作用<sup>[26]</sup>;等等。

梳理和分析近代西方主流媒体《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文本,不仅展示出了面对日军暴行,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坚强乐观、不屈不挠的斗争姿态,而且字里行间折射出其同情中国抗战、谴责日军残暴的舆论导向,这使得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一度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战时中国的象征,既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说明:本文涉及《泰晤士报》的原始文献来源于 Gale 集团专题数据库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泰晤士报数字档案,1785-1985),检索关键词“Chungking”,检索时间段为 1938 年至 1944 年,但主要集中于 1939 年至 1941 年。

## 参考文献:

[1]Chungking Bombed[N].The Times,1938-10-05(16).

[2]Chungking's Ordeal:Scenes After Air Raids[N].The Times,1939-06-26(18);Picture Gallery.The Times,1940-10-02(3).

[3]The Bom bing Of Chung king[N].The Times,1939-06-14(10).

- 
- [4]潘洵. 不应忘记的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9-15(7).
- [5]500 Killed In Chung king Air Raid[N]. The Times, 1940-05-30(5).
- [6]Chungking Heavily Bombed[N]. The Times, 1940-06-14(5).
- [7]Heavy Raid On Chungking[N]. The Times, 1940-06-29(5).
- [8]Japanese Bombs On Chungking[N]. The Times, 1940-08-21(3).
- [9]Chungking Swept By Great Fire[N]. The Times, 1940-08-22(3).
- [10]700 Chinese Dead In Shelter[N]. The Times, 1941-06-07(3).
- [11]Mass Raids On Chungking[N]. The Times, 1941-06-09(3).
- [12]Chungking's Ordeal[N]. The Times, 1939-05-06(12).
- [13]Japanese Bombing Of Chungking[N]. The Times, 1939-05-13(14).
- [14]Bomb Wrecks British Consulate[N]. The Times, 1940-06-26(5).
- [15]Chungking Bombed By Moonlight[N]. The Times, 1939-08-05(11).
- [16]Chungking Again Raided[N]. The Times, 1941-06-17(3).
- [17]Bombed Embassies In Chungking[N]. The Times, 1941-07-02(3).
- [18]Chungking Raided Again[N]. The Times, 1941-07-09(3).
- [19]Bombing Of Chungking Embassy[N]. The Times, 1941-07-16(3).
- [20]4, 000 Casualties In Chungking[N]. The Times, 1939-05-08(14).
- [21]China Holding Out[N]. The Times, 1939-11-18(7).
- [22]Chungking Raided Again[N]. The Times, 1941-05-12(3).
- [23]蔺志强, 刘文立.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1897-1899年)[J]. 学术研究, 2007(2).
- [24]Toll Of Air Raids In China[N]. The Times, 1939-12-07(7).

---

[25]Evacuation Of Yunnan[N]. The Times, 1940-09-20 (3).

[26]中国英勇抗战,已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N].中央日报,1941-08-21.